

疫情中的社会治理策略： 社会团结与传染病菌的对抗

王天夫

摘要 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疾病危害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其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从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上讲,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影响是社会性的:它通过社会连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时空伴随的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安排高度重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不同的冲击。更为根本的是,新冠病毒的传播也毁坏社会连接,直接攻击社会团结,动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根本基础。传染病菌与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瘟疫能够动摇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危及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证明,巩固的社会团结与协同合作是应对传染病菌挑战的社会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 传染病菌;新冠疫情;社会连接;社会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风险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2-016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8);清华大学“双高”创新项目(2021TSG0820)

从2020年初开始到现在,新冠病毒的疫情带来的巨大损害,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感染新冠病毒,首先危害个人的身体健康,重症患者甚至有生命危险;其次,新冠疫情也让个人感到焦虑与紧张,导致心理问题。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冠疫情给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截至2023年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超过6.60亿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而更有超过669万人因为新冠肺炎失去生命^[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产与贸易往往离不开早已紧紧相连的全球市场,产业分工使得重要的生产活动相互依赖于世界各地的各个产业链节点。新冠疫情带来的人员与材料流动的中断,导致了生产活动的广泛停止。2020年的众多经济统计数据,除去中国以外的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负增长,遭遇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P56-67)。事实上,新冠疫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它已经蔓延成为经济生产危机、社会生活危机、政治治理危机。更有甚者,不同国家立场各异,相互攻击,导致国际关系危机。

从社会思想的根本性议题出发,可以更进一步观察与理解新冠病毒对于社会本身的危害:它直接攻击人的社会属性,它特别攻击社会团结,攻击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基础,它正在冲击着整个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应对疫情,需要保卫社会,维护社会团结,促进协同合作。

一、社会连接的主题:应对新冠疫情的三个重要策略

过去两年多以来,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可以短时间内迅速波及更广大范围的人群,使得人们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应急策略。除了在个人层面的卫生消毒等行为,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有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显示出人类社会连接的重要意义。

(一) 流行病学调查

2022年11月11日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前,在确认新冠病毒感染者后,需要立即开展核实感染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当前的身体状况以及过去一段时间内(通常为14天或者7天)的具体行程,包括经过的地方、接触的人群等,梳理此一感染者的行动轨迹、感染源头与过程、密接人群、潜在的传播路径等。其目的在于向上推理溯源、向下摸排传染链条。这是为后续防疫措施(判定密接者或是采取隔离)的决策提供流行病学的基础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流行病学调查是摸清传染病毒在普通人群中传播的第一步,也是采取有针对性防疫措施的第一步。在给定防疫政策与措施的前提下,流行病学调查完成的时效性决定了防疫措施的有效性。事实上,快速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是在与病毒的传播展开一场时间上的赛跑。

传染病毒的传播是在人们匆匆忙忙的工作与生活中进行的。这一过程通常无声无息难以防范,但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才能够完成。所以,社会连接是病毒传播的链条与前提条件。在所有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都可以发现新近感染者与已有感染者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接触,也就是物理空间上的临近或者称之为时空伴随。在最后呈现出来的流行病学调查图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感染链条两端的感染者之间的社会接触情形。能够产生这样的时空伴随的社会接触,无外乎两种情形。其一是,前后感染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因而在特定时间内有着密切的社会互动;另一种是,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处在相似或相连的社会结构位置中,在特定的时空位置上有着相互交集。前者的例子可以是已有感染者的家庭成员、临近邻居或者雇主雇员等。而后者的例子,可以是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偶然相遇的两人,或者是在同一家餐馆用餐的邻桌食客等。在后一种情形中,同乘一辆公共汽车或是在同一家餐馆用餐的背后,是一系列相似的社会特征,包括同为非私家车车主、相同的上下班通勤路线、居住在同一片地理区域、在相邻上班地点工作等。

传染病毒就是通过这样的时空伴随所形成的社会接触完成传播过程。正如上面所列举出来的一系列例子,这些社会接触与社会连接的背后,体现了相互连接的社会位置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社区、同一个生产组织、同一个职业群体、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消费阶层等。因此,从病毒的传播过程中可以看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与社会结构。反过来,流行病学调查也一定是顺着这些社会结构所锚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连接,从人们匆忙且看似混乱无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过程中,梳理病毒的传播链。

(二) 疫情中的协同合作

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如此之快,其起初的致死率极高、危害性极强。在普通人群中第一轮传播开之后,其应对需要大量的医疗资源与生活资源保障,任何小群体、单独的城市甚至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都难以独立应对。所以我们看到,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时,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援队紧急前往武汉支援,充实已经接近崩溃的医疗救治系统;全国各地的物质资源保障,也在众多卡车司机的拼力运输中源源不断地送往武汉;在当地,众多快递小哥废寝忘食地投入物资投递中。

在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仅是病毒传播的范围跨越国境,能够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与此相应的是,国与国间的援助也从未间断。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医用物质紧张,国际援助很快到来。当日本民间与官方的医用救援物资送抵武汉与其他城市时,救援赠语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确展示了天下同心、共抗疫情的情形。当中国人民顽强地取得了第一波抗疫胜利后,马上开动医用物质生产与疫苗研制。在后来的对外援助中,当中国的医用物质援助与疫苗捐赠在亚非拉与欧洲都大规模出现时,也展示了中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承担重要责任与使命的立场与气派。

在这场新冠疫情中,快速认识理解病毒的生物学机理,是使用科学技术抗疫的重要基础。在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中,病毒基因测序工作在疫情消退六个月后才完成。而这次新冠疫情中,研究者们第一时间获取了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除了新的测序技术的使用之外,全球流行病学与病毒学专家之间的无私合作大大加速了基因测序工作。在2020年1月5日,中国上海的科学家分析得出单株新冠病毒

的基因测序之后,将最早的结果上传到开源基因数据库;几天后,英国学者参与进来,做了一些调整,于当月11日在公开网站发布完整基因测序数据;随后,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发布了近200份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3](P223-227)。这些早期的研究数据为接下来三个月内发展出来的快速诊断检测,以及后来在各个国家展开竞争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用药的研制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协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新冠疫情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由病毒基因测序开始的跨国合作也是这次全球科技合作对抗病毒的开始。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球协同合作是人类抗疫力量的源泉。这样的协同合作也必然加强现有的社会连接与社会关系。

(三) 疫情中的隔离

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与重症率较高;随着预防疫苗的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显示了其突破疫苗防线的特征;而高效的治疗药物短期内难以研制出来。这些都使得应对新冠疫情的最有效措施仍然是物理性地隔离感染者,切断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链条。事实上,过去几年间,隔离措施在各个层面都得到运用。在城市尺度上,有封城中的人员不进不出,与外界的日常人员流动完全停止。在城市内部,有分区域的城市静默,除了保障城市基本运营的岗位,其余人员均居家办公。在社区层面,发现感染者之后,除了转运感染者到集中隔离点之外,整个社区处于隔离观察状态,严格控制人员的出入。特定的楼宇和家庭户,也有处于居家隔离的封控管理状态,物质保障由社区志愿者运送提供。从风险区流动到本地的人员,也集中在指定旅馆单独隔离等。所有这些不同等级与尺度的隔离政策,曾在不同的疫情情势与不同的地区分别使用。

在很大程度上,隔离措施是没有其他更有效方法时的应对办法,也是目前最有效的阻止病毒传播的办法。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隔离措施在截断病毒的传播途径的同时,也中断了人们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过程,中止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这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物资供给的不足、社会活动的匮乏及经济活动的停滞等;当然也导致在个人层面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带来潜在的心理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传染病毒的传播依赖于社会连接的过程,从一个感染者传染到下一个感染者。而应对疫情的措施,也必须特别考量和利用病毒传播的这一特性,在深刻理解产生社会连接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后采取有效的抗疫政策与方法。

二、病毒传播的社会性及其后果

病毒有着自身的自然起源,其存在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社会。但是,一旦传染病毒在人群中传播开去,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成为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冠病毒的传播同时也具有社会性。

(一) 新冠病毒的生理学与病理学特征

新冠病毒具有强传染性并且难以预防,这是由其生物学与病理学特征所决定。在疫情暴发后,全球众多传染病学专家投入了巨大资源,尝试着解析新冠病毒的存活与传播机制。结果显示,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通常包裹在聚糖分子之中,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察觉,开始融合人体细胞外膜;在解开宿主细胞膜之后,刺突蛋白打开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通道;随后,病毒改造宿主细胞内膜,形成一种遁形适应机制,让病毒核糖核酸(RNA)难以被发现;这样一来,病毒可以安全快速地开始其复制过程;在人体细胞内,新冠病毒通过切断其他细胞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系统清除竞争对手,大幅度降低细胞蛋白质的信息翻译系统的运行,关闭细胞的预警系统等策略,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在源头上扰乱人体免疫能力的超级病毒^[4](P640-644)。因此,相对于人体免疫系统的追捕而言,新冠病毒具有超高的逃逸能力;同时,其本身变异的速度也较高。所有的这些都显示了新冠病毒对于感染者的呼吸系统等有重大的危害。事实上,一旦新冠病毒打开人群传播的途径,就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其对于个体的身体健康的重大危害,转化成对于社会的重大影响;其生物性与病理性的特征就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后果。

(二) 病毒传播的结构性社会特征

病毒传播的社会性,并不仅仅在于其在社会人群中大范围传播,并带来广泛和严重的后果;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病毒的传播途径与过程,是通过人类社会基本的连接性特征来完成的。如果说病毒在个体身体中的感染过程是由病毒的生物性与病理性特征所决定的,那么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则必须叠加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特征之上。因此才会有,在人口稠密交流繁多的城市里,病毒更容易暴发。在大城市之内,病毒的传播在人群聚集时最容易暴发,在城市活动骤减的静默期则难以继续。因此,病毒的传播取决于社会人群是如何相互连接的,也取决于相互连接的人群是如何互动的。

归结起来,通过社会连接传播的病毒感染过程,有以下几个社会行为上的前提特征。首先是身体在物理空间上的临近。由于新冠病毒在人体之外存活的时间较短,病毒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潜在感染者吸入或者接触(眼、鼻、口)感染者释放出来的飞沫或者气溶胶完成。这一过程通常发生在密切接触环境中,要求感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上相临(1米范围以内;或者在密闭拥挤室内稍远的距离)。其次是社会行为上的处在同一社会过程中。空间上的近距离,转换成社会行为过程,则是表明潜在感染者与感染者处在同一行为过程里。他们可能是相熟的朋友,相约在酒吧中重逢聊天;也可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同时来到酒吧里消遣娱乐。正好这个酒吧中有一个不自知的感染者,这些相熟的朋友与不相熟的陌生人则成为了病毒传染链中的一环,在同一个密闭环境中同一个社会行为过程中,完成了病毒的传播过程。最后是时空伴随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相互映照重叠。卷入同一社会过程往往涉及处于相同社会结构位置的社会成员。毫无疑问,前述在酒吧中被感染的人群,显然是有着酒吧消费能力与意愿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群。同样的,因为乘坐公共汽车而成为密接人员的群体,则又同属另一个社会群体。

病毒传播的社会性特征,还显现在其传播过程在社会结构上有着显著差异。首先,社会结构中不同的人群感染病毒的风险并不一致。回到上述的酒吧传染的例子,生活中没有到酒吧消费的社会人群,显然就没有在这样的人群聚集的场合感染病毒的风险;同样的,有车一族平时自驾小汽车上下班,通勤过程中并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此也没有因为乘坐公共汽车感染的风险。其次,不同社会位置中的人群对待疫情的认知与应对策略并不一致。因为背景知识的差异,使得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理解与认知新冠病毒的生物学与病理学特征上差异显著,继而转变成在平时工作与生活中的行为差异,最终形成感染风险的差异。最后,面对疫情带来的广泛影响,不同的社会成员受到的冲击不一致。不同的人群,因为他们的资源(包括物资储备、社会关系、疫情信息以及社会身份等)并不相同,应对疫情的方式必然不同,采用的应对措施往往不一样,得到的援助与结果也差异明显,因而疫情中受到冲击影响的后果往往也显著不同。在1918年暴发的全球性大流感中,非洲南部各个人群的死亡率差异明显,白人为2.6%,黑人、印第安人与其他有色人种将近6%,而特定矿区矿工群体则高到22%^[5](P39)。天花接种在18世纪的英国逐渐推广开去的过程,也显示了社会政治因素对于应对病毒感染的差异。天花疫苗接种最早被引入英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皇位继承人接连感染天花而死导致了皇室危机。也正是此因,天花疫苗接种最早是在1722年成功注射给英国皇室儿童,随后在18世纪40年代才在整个英格兰推广^[6](P202-206)。

(三) 传染病毒对于社会的冲撞

2009年一项对病毒的研究显示,在2600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形成的矿物晶体岩洞中,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生命,但是却发现每一滴矿物热水中含有近2亿个病毒^[7](P4)。可以想象,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对于病毒的现代科学研究,公认的起始点是1898年,贝杰林克使用精细过滤网过滤患病的烟叶叶汁,认识到导致烟草花叶病的罪魁祸首并非细菌,而是另一种体积更小的生命形式,他命名为病毒^[8](P19-20)。即使到如今,对于病毒的认知还处在起始阶段,不仅仅是病毒的起源与病理特征亟待探索,连病毒的种类辨认也刚刚开始。直到21世纪初,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健康的人体肺部不存在病毒或病菌。然而,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健康的人体肺部驻扎着170多种病毒,其中超过90%以上是迄今科学研究没有任何记录的病毒种类^[7](P5)。即使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之下,新冠病毒如何攻击

人体细胞的病理学机理仍然处于早期研究阶段^[41](P640-644)。

但是,病毒与人类的共存早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事实。在更具广阔宏观视野的历史学家眼中,作为与外界交换获取生存食物的人类,一直处在包括各种病毒细菌等的微型寄生与包括大型天敌的巨型寄生的生态平衡体系之中^[61](P6)。显然,人类在自然界中摄取食物获取营养的同时,也成为其他物种觅食获取营养的源头,这其中就包括病毒。寄生在人体内的病毒,有的对于人体并无大碍,形成与宿主的和平共处;有的则可能引发急性疾病,要么杀死宿主,要么为人体体内激发的免疫反应所杀死。在这个对抗人体的过程中,病毒一直在寻求机会传染到下一个人体,维持自身的生存。当这样的一个传染过程在人群之中大规模暴发时,就形成了传染病的公共健康危机。

一旦这样的公共危机发生,当然就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传染病的暴发,往往显得起源突然。有的病毒在被控制后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又卷土重来。在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的时代,病毒传染疾病的暴发事例往往太过偶然,并且难以进入历史学家的因果机制阐释框架,所以往往被一笔带过或是直接被忽略。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公共传染病的事例并不鲜见,也逐渐成为社会史与医疗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天花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土,直到近代都是能够带来重大危机的传染病毒。在清代的江南,天花病毒时常隔了数年就流行起来,记录在册的共有10次,其中7次发生在宁波府,时隔9年到12年不等;一旦暴发,带来特定地区大量的人口衰减,情形严重的道光咸丰年间的杭州,有的地方近1/2的儿童死于天花暴发^[9](P72-74)。在应对这样的疫情时,也只有整个社会的团结合作,才能够渡过难关。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与暴发,得到了官府与社会团体的应对,医学知识的普及、医疗措施的推广(如兴办牛痘局等)以及医生职业的拓展也得到极大的发展。这些必然导致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反映在社会人口上,江南的人口在整个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稳步增长,这不能不算是积极应对瘟疫的后果^[9](P290-297)。

因为不同的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与病毒共存的状态有着重大差异。表现出来则是,不同的社会往往携带或者寄居着不同的病毒,不同的社会对于不同或者相同病毒的免疫对抗能力不同。例如,温带地区的病毒相对于寒带地区种类更多活性更强,但是相对于热带则是种类较少活性相当。从人类历史上看,东西向延展的温带大陆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与传播,人们聚居在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开始了农作物与家畜动物的驯养过程,这一过程带来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人口^[10](P168-185)。也正是因为人口更大规模的聚居以及与动物的混居,使得传染病毒在人群中得以更广泛地传播^[8](P63-78)。所以,处在这一人口聚集的欧亚大陆中的各个社会,相比其他地理空间中的社会,经历和携带着更多更复杂的传染病毒,同时也有着更强的病毒免疫能力^[10](P200-207)。

因此,不同社会间的碰撞一定会带来传染病毒的碰撞。这是因为,病毒的传染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之间的人员交往,一定导致病毒从一个社会登陆另一个社会。事实上,清末时期的江南之所以有更多瘟疫,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江南不仅社会经济发达,人口交往流动频繁,同时也是对外开放交流的第一线,而疫情也更多暴发在苏松太地区(苏州府、松江府与太湖地区)与宁波府等地^[9](P58-64)。

在更大尺度的社会变迁中,传染病毒可以在社会之间的碰撞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瘫痪和摧毁无法应对病毒的一方。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中并不携带欧洲旧大陆已有的那些传染病毒。当科尔特斯在1520年带着600人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也随行带来了天花病毒。当时的阿兹台克人口多达2500-3000万。但是在随后的对抗中,特诺奇蒂特兰城市暴发了天花传染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战斗,而已经具有天花免疫能力的西班牙侵略者从失败中联合同盟军,回头发起攻击,竟然占领并摧毁了都城。这一过程彻底摧毁了阿兹台克人的健康与心理,成为科尔特斯征服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在科尔特斯打开墨西哥大门并开始与欧洲旧大陆开展密切交流之后,到了1568年,墨西哥中部的人口骤减至300万人,仅为原有人口的1/10^[6](P162-170)。因此历史学家认为,传染病毒作为隐藏的生物武器,在西班牙人屠杀印第安人殖民美洲的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三、传染病菌与社会不可调和的对抗

除了病毒的体积结构与细菌有所差异以外,这两者统称病菌,其引起的传染疾病对于人类来讲非常相似。关于新冠病毒的重大危害,现有的讨论往往从病理学的视角出发,讨论病毒感染者的身体健康(呼吸系统器官和其他内脏器官可能会受到损伤),严重的可能危机性命;当大范围的人群受到感染时,其影响则扩展成为一个危害广泛的公共健康危机。其中的更为细节的社会经济危机,可以表现为生产停滞、贸易中断、经济危机、社会耻辱标签与社会歧视、群体冲突、政策失误与公权力滥用以及基层治理失效等。

(一) 对于传染病社会后果研究的局限

所有上述关于传染病菌在卫生、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危害都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揭示这些危害及其潜在的后果,成为对抗病菌的价值基础,也是制定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特别是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至少可以察觉出上述研究视角的两个局限。这样的局限不仅仅限制我们对于当前新冠病菌危害性的理解与解释,同时也可能影响到疫情应对政策与措施的制定过程。对这些局限性的再思考与拓展,可以提供应对疫情的不同思路。

首先,上述所有关于传染病菌危害的讨论,都是在“社会内”的视角上展开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讲,上述讨论无论是从个人身体健康还是社会群体冲突层次,都是认定了病菌所影响危害的,是在社会宏观框架之下的特定部分或者与之相联的范围更广泛的部分。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病菌有着其本身的自然起源,其存在远远长于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即使当前的传染病菌是与人类社会共存,但其演化变异的过程往往有着自身简单高效的机制,并不是人类社会的附属物。因此,传染病菌是与人类社会本身并立或是对立的物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则应该将传染病菌的危害提升到对应整体社会的视野。即使我们都知道,病菌的变异过程通常会逐渐降低病菌对人体的损伤,但是由传染病菌引发的人类社会的不当应对,正如历史上大瘟疫带来的各种影响深远的恶劣后果一样,有着潜在的动摇人类社会轨迹的可能,也有着危及人类社会文化与文明的可能(正如印第安人的不当应对带来的是印第安文明的消逝)。

其次,现有的关于传染病菌社会后果的讨论,更多的是从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出发,拓展到更大范围更多的个体的危害。即使包括了对潜在的社会歧视与群体冲突的分析,也是被局限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所以,这些讨论都是关于社会性特征下传染病菌的危害。诚然,个体组成群体,群体组成社会。没有对于个体与群体的讨论,不可能有对于社会的讨论。但是,个体的扩展与集合从来都不是社会的全部,甚至都不能成为社会形成的基础性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把握传染病菌带来的危害的根本,也没有展示其社会危害的全部。

要克服上述两个局限,则需要从“社会本身”的视角来审视传染病菌的社会危害。在社会学看来,能够形成社会的基础性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凝聚的机制,亦即社会团结。的确如此,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团结,就不能成其为社会。事实上,新冠病毒所损害的正是社会团结以及社会其本身。

(二) 重返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的主题

独立的个人的集合不能被称为社会。一定是相互连接的个人,沟通交流进行互动后产生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结构,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因此,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原有的社会连接方式发生了变化时,社会学关注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连接的形式为何? 社会关系如何产生? 这也是经典社会学大家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时,所提出来的经典问题:社会何以可能?

在其代表作开篇的主题阐述中,滕尼斯直接归纳了人类群体的两种类型及其形成机制^[1](P52-57)。其一是共同体,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在天然本能与习惯信仰的连接中形成共同体,是亲密持久、秘密

单纯的共同生活过程。其二是社会,以独立的个人及其意志为基础,在明确目的与利益达成中形成社会,是表面短暂、公开算计的共同生活过程。前者是有着长久历史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后者是新近的“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1](P54)。与此相呼应的,涂尔干认为社会成员具有“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这是一种“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12](P42)。当社会中的个人高度相似,个人意志与群体目标重叠时,一种内在的力量能够使得个人行为趋于一致,这就是机械团结^[12](P68);在社会分工的情形下,个人差异成为社会所需并完成各自特别的职能,共同完成社会的运行,个体之间相互依赖,这就是有机团结^[12](P89-90)。虽然滕尼斯与涂尔干在价值立场上有进步与保守的差异,但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都在于,社会中人与人连接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凝聚与社会团结的根本性机制。即使工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形态,但是深藏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社会团结依然坚固,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

数字社会已然来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方式正因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而改变,线上与线下连接交错纠缠,放大现实生活中的一致性与对立性^[13](P74-75)。毫无疑问,社会的变革又到了需要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社会连接的时刻。可以看到的是,虚拟空间中的社会契约与社会秩序正处在萌芽与生长阶段;而亟须探索与发现的,则是未来社会团结的实现机制到底在哪里?在这样的剧烈变革时期,因为新冠病毒直接冲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攻击社会团结,也极有可能让这样的任务变得更艰难。

(三) 病菌与社会不可调和的对抗

跳出其对于个人健康损伤的个体视角,传染病菌对于社会本身的损害表现在对社会连接的破坏与社会团结机制的挑战。传染病菌寄生在个人体内,但对社会连接的损害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损伤个体健康的同时,使得患病的个人无法完成社会任务,使得其无法参与社会事务,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连接;其次,毒性较强的传染病菌有可能杀死宿主或者重伤宿主,导致原有社会连接直接崩溃或者干脆消失;最后,因为病菌的传染性,其他社会成员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主动选择远离感染者,这直接导致社会连接的暂时性中断。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传染病菌也挑战现有的社会团结机制。首先,传染病菌的到来与流行,在社会上形成两部分人群,感染者与潜在感染者。因为传染病带来巨大的危害,这两个人群围绕着传染病菌形成各自差异巨大的利益,更进一步形成巨大的群体对立。这样的对立能够直接转化成心理与物理上的界线,隔断这两个人群。其次,这样的心理与物理上的界线,可以生成社会意义上的界线,生成一个群体对于另一个群体互不交流的社会隔离。如果情形进一步恶化,这样的社会隔离升级成为社会歧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群体间的冲突与攻击。

显然,一旦社会团结遭到破坏,社会整合机制将失去效力,社会秩序将会紊乱,失范行为将会增多。这样的恶果必然将是灾难性的。麦克尼尔转述了这样一段史实描述,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大流行过程中,对死亡的恐惧很快占据了上风,群体间的对立形成,相互指责与相互攻击成为常态,进而社会团结遭到破坏,整合社会的日常规范与习俗制度随之而崩溃。在日耳曼及其邻近地区,犹太人被其他社会群体毫无理由地指责为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遭到公开的谴责与歧视,众多激进者撇开国家与政府的权力体系,利用私刑鞭打攻击犹太人。这样的私刑大量流行并且极其残酷,变成了一场对于犹太人的杀戮,也直接导致了犹太人向东欧的迁移^[6](P148)。

(四) 传染病菌对社会的损害与依赖

根据病菌本身的生物学属性,其需要不停地传播,扩大感染范围。病菌的传播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完成。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病菌必然将不停地寻求社会连接的机会,完成传播。所以,病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相爱相杀”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传染病菌不停地损伤个体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需要以此个体为起点的社会连接完成下一次传播过程。对于社会,传染病菌一方面在损害社会,攻击社会连接,挑战社会团结;另一方面又依赖社会,必须通过社会团结机制形成的社会连接完

成感染扩张。

因此,病菌在传染过程中,在社会层次上形成了一系列的难以调和的悖论。第一,病菌传染链的悖论。病菌的传播需要建立传播链,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从感染者的这一端传播到另一端的未感染者,这样才能完成一次全新的感染过程,并不断地复制这一过程,达成扩大感染范围,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是,一旦完成感染,病菌就开始损害感染者的身体健康。因此,病菌在完成传播的同时,也正在损害组成传染链的社会连接的两端个体。所以,为了保留传染链,随着病菌传染的扩张,病菌的致命性一定会下降。即使病菌感染对于宿主的损害逐渐降低,但是因为病菌本身属于人体之外的侵入物,人体免疫系统一定会做出反应并展开攻击,这一过程也必将带来对人体自身的误伤。

第二,应对传染病菌疫情的合作悖论。在全球化的当前,对疫情的应对需要高度的协同合作。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发展,使得病菌瘟疫并不是神秘不可知,因而人们不再寻求巫术或者其他离奇方式来应对,而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积极应对。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医药疫苗研制、抗疫物资与生活保障物资的生产与供给过程中,都需要不同人群的合作分工共同应对。毫无疑问,这样的合作协同过程,必然带来更多的人员与物质的流动以及相应的物理接触机会,这也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因此,旨在对抗病菌传播的合作,必然增加疫情防控期间合作者之间以及物质传递带来的接触机会,也增加了病菌感染的潜在风险。

第三,隔离阻断的悖论。虽然当前的现代医学知识能够快速揭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病理学危害以及公共传播过程,但在生产治疗药物上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同时,病菌的快速演化变异,也使得特效疫苗难以被快速生产出来。因此,在该前提下,应对疫情的最有效方法依然是物理隔离。社会的基础在于社会连接,病菌传播的前提也是社会连接,合作应对疫情也需要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然而,对人类社会而言,目前应对传染病菌最为有效的,则依然是自我选择的阻断社会连接的物理隔离。这与病菌依赖于社会连接完成传播,同时又损害处于社会连接两端的个人身体健康,有异曲同工的矛盾逻辑。

四、疫情中的出路:团结合作与守护社会

社会的基础在于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传染病菌对社会的直接攻击也在于损害社会连接与挑战社会团结。同时,应对疫情的任务需要各个方面的协同合作。因此,面对新冠病毒,的确应该牢牢守护住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这也是疫情中社会学省思的结论。

(一) 作为社会力量源泉的社会合作

在讨论人类生产能力的提升的过程中,亚当·斯密首先论述的就是劳动分工。在他看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本能倾向的分工,提升了工作的熟练程度、节约了从事多种工作的转向时间并导致了机器的发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4](P9-11)。事实上,通常被忽略的是,亚当·斯密在随后讨论分工的起源时,明确指出劳动分工融合了不同个人之间的差异,能够让人们从事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并能够在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完成交换。显然,正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才能使得人们发挥优势,合作生产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必需品和便利品”^[14](P15)。因此,分工合作提升了社会的生产能力。当然,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分工也显示了人们相互依赖,增强社会连接,促成社会团结^[12](P89-90),在更早期时期的孔德也阐述了相同的思想^[12](P26)。

分工合作提升社会产出、成为社会力量源泉的例子,在数字时代的网络连接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就在20多年前,编辑百科全书是一项极其繁复的工作,甚至需要花费众多学者的毕生精力来完成;而纸版印刷的百科全书通常册数较多,花费不菲;所以难以想象,百科全书可以成为所有人免费查阅的公共资源。因此,当免费便利的网络百科全书出现时,旁观者充满怀疑。起初,几乎所有人都嘲笑过其错误连篇、谬误连连。但是,由于其修订的便捷,在任一时刻全球的某一个角落都有人在修订网络百科全书的内容。通过这种几乎无限制的分工合作,在“群体智能”(wisdom of the crowds)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网

络百科全书不仅仅大幅提升了内容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同时也成为众多网民获取知识的来源,成为互联网分享知识、赋权个人的成功范例。

(二) 以社会团结对抗传染病菌

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是人类社会力量最重要的源泉,能够提醒人们在面对传染病菌的威胁时团结协作,凝聚力量共同应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可拆分的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这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事务,更不用说传播能力极强的新冠疫情了。如今的医学知识远远不能实现对新冠病毒的彻底了解,需要全球科学家的通力合作;如今的各项事业高度分工深度合作,医疗物资与生活物资的生产都需要全球化的产业链精细的协作。事实上,过去三年的实践证明,任何极端个人主义的疫情应对,带来的往往是疫情的快速扩散,以及潜在的医疗资源的争相挤兑与政策应对的捉襟见肘。

在隔离期间,社会连接暂时中断,此时在更大范围内的协同合作必不可少,原因也正是在于社会团结是应对疫情的有力武器。首先,身处隔离之中的感染者,除了电子通信网络以外,其与外界的各种直接联系均被切断;其物理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内心受到对未来不确定的煎熬。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带来特定的社会心理的后果。加强这些身处隔离的感染者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上述负面后果。与此同时,整个隔离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感染者与隔离区工作人员的相互配合,还需要更大范围内的物质保障、心理疏导以及医疗队伍的协同配合。传染病菌传染性强,任何疏漏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隔离任务的满盘皆输。

在疫情中,保卫社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传染病菌对于社会的攻击一旦动摇社会团结的基础,通常会引起社会内部的混乱,轻则分裂社会甚至自相残杀,重则让整个社会瘫痪失能直至完全崩溃。前面已经提及了14世纪黑死病(鼠疫)疫情中,日耳曼人对于犹太人的不公正指责与种族杀戮。即使在20世纪的美国,依然存在由传染病引起的社会歧视及其恶劣后果。作为感染过伤寒症并已经免疫的爱尔兰移民“伤寒玛丽”,被恶意指责为传染源头,在1912年和1915年两次被关入隔离所,后一次直至她在1938年老死其中^[15](P414-415)。在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中,《洛杉矶时报》刊登了早期死于疫情的患者姓名,将社会舆情引向墨西哥移民社区,而后没有执法权的橙县卫生官员下令暗中隔离2个墨西哥街区,后来又将隔离扩展到其他3个没有发现任何确诊鼠疫病例的街区。后来证实,这一官员的越权命令,显然是出于种族歧视,而根源在于他在更早时期参与处理了墨西哥移民的天花与麻疹病例^[5](P72-76)。当然,最惨烈的当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殖民者侵略之下的印第安人。经历了天花感染的“悲伤之夜”(noche trista,刚刚重创入侵者的将领和军队几乎都染病身亡)之后,阿兹台克人看到了己方大量的人口快速死亡,而西班牙入侵者毫发无损;他们从超自然的解释中得出,敌我双方的神明一致性地惩罚己方,庇护敌方。这种死亡的黑色恐惧直接导致了阿兹台克人信仰体系与生存意志的坍塌,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团结的崩溃。他们再也不能也不愿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抗击入侵者的行动,屈从于入侵者的卑劣与残暴,600人的殖民者竟然征服了由近3000万人在广袤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6](P168-170)。这场天花传染病瓦解了阿兹台克人的社会团结,摧毁了社会力量的源泉,无疑成为阿兹台克文明瓦解与消失的开端。

在《瘟疫与人》出版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慨叹麦克尼尔治学视角的新颖与推导结论的大胆。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历史学家与普通人对传染病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传染病菌给社会带来的损害与战争同样巨大,“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16](P96)。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知识的积累,人们正在增强自身应对瘟疫的能力。但是,传染病菌不会消失,因为人类总是寄生于和被寄生于大自然的生态龕之中,传染病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化,从不缺席,并一直将影响人类^[6](P236-237)。正

如加缪所言,“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16](P303)。传染病菌一直都在默默演化变异,终究有一日,它会卷土重来。而这时,人们需要做的,一定是坚守社会团结,保卫社会,不能让瘟疫击溃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 [1]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WHO.[2023-01-13] <https://covid19.who.int/>.
- [2] 张国洪,李婧婧,王庭锡等.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复苏面临潜在风险——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和2021年展望. 全球化,2021,(3).
- [3] Y. Z. Zhang, E.C. Holmes. A Genomic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 and Emergence of SARS-CoV-2. *Cell*, 2020, 181(2).
- [4] Megan Scudellari. How The Coronavirus Infects Our Cells: Scientists are Unpicking SARS-Cov-2's Life Cycle. *Nature*, 2021, 595(7869).
- [5] 马克·霍尼斯鲍姆.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谷晓阳、李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 [6]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 [7] 卡尔·齐默.病毒星球.刘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8] 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爆发.沈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9]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0]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王道还、廖月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
- [11] 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2]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13]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12).
- [14]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15] 约翰·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
- [16]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郭宏安、顾方济、徐志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Social Governance Strategy in the Epidemic: Social Solidari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Wang Tianfu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ease caused by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does harm to the health and life safety of individuals and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has serious social consequences in the wider social scope. In terms of more profound social consequences, novel corona-virus is social. It spreads between people through social connections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overlaps with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bringing different impacts to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More fundamentally, the spread of novel coronavirus also destroys social connections, directly attacks social unity and shakes the fundamental foundation of "society as society".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an irreconcilabl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ociety, the plague can shake the trajec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en endanger huma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testify that consolidated social unity and cooperation constitute the social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 COVID-19 pandemic; social connectivity; social solidarit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ciology of risk

■ 收稿日期 2022-06-26

■ 作者简介 王天夫,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 责任编辑 李 媛